



鲁迅翻译研究

顾 钧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鲁迅翻译研究

福建教育出版社·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翻译研究 / 顾钧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334-5191-2

I. 鲁… II. 顾… III. 鲁迅(1881~1936) — 翻译 — 作品 — 研究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0849号

鲁迅翻译研究

顾钧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27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10-62027445

印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5区7号楼 邮编: 100070)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20.5

字数 305千字

版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62027445)联系调换。

目 录

导言：作为翻译家的鲁迅	1
第一章 鲁迅的翻译思想	12
第一节 关于“硬译”	12
第二节 翻译材料的选择	28
第二章 鲁迅前期的翻译	49
第一节 科学小说	49
第二节 《域外小说集》	58
第三章 鲁迅中期的翻译	79
第一节 《工人绥惠略夫》	79
第二节 《一个青年的梦》	91
第三节 《现代日本小说集》	100
第四节 《现代小说译丛》	116
第五节 《苦闷的象征》	120
第四章 鲁迅后期的翻译	134
第一节 《思想·山水·人物》	134
第二节 苏联文艺理论	140



第三节 “同路人”文学	152
第四节 《死魂灵》	164
第五章 鲁迅其他与翻译有关的工作	175
第一节 几套翻译丛书	175
第二节 《译文》	192
第三节 与翻译合作者的关系	202
第四节 与青年翻译者的关系	221
第六章 鲁迅翻译与创作的关系	237
第一节 翻译与创作互补	237
第二节 翻译对创作的影响	243
鲁迅翻译年表	254
参考文献	310
后记	318

导言：作为翻译家的鲁迅

—

钱鍾书先生在“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时说：“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愈多。”^① 确实，鲁迅作为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文学史家、古籍整理专家、翻译家等诸多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但遗憾的是，鲁迅作为翻译家的成就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们将太多的目光集中在他的创作上。实际上鲁迅本人对这样的做法是非常反对的，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创作翻译和批评，我没有研究过等次，但我都给以相当的尊重。对于常被奚落的翻译和介绍，也不轻视，反以为力量是非同小可的。^②

重创作轻翻译是很容易产生的倾向，20 世纪 20 年代有人开玩笑似的说过，创作乃处女，翻译不过是媒婆。鲁迅对此说大不以为然，驳斥道，这种论调“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而中国迫切需要的却正是“收纳新潮，

① 钱鍾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三联书店 2002 年版，第 201 页。

② 鲁迅：《新的世故》，《鲁迅全集》第 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1 页。以下引用《鲁迅全集》皆用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脱离旧套”^①。鲁迅终生坚持这样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一定要面向世界，决不能闭关保守。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鲁迅的翻译，或者作为翻译家的鲁迅都是非常值得认真和深入地研究的。从数量上来看，鲁迅的翻译丝毫不少于他的创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最醒目地体现在1938年版以及1973年重印的20卷本《鲁迅全集》中，其中后10卷全部是翻译作品。而1958年版、1981年版和最新的2005年版《鲁迅全集》，实际上只是创作全集，只是半个或小半个鲁迅，这是因为大家感到有必要将鲁迅的翻译单独出版。1958年出版的10卷本《鲁迅译文集》，材料比20卷本《鲁迅全集》的译文部分搜集得更加齐全。现在，更新版本的《鲁迅译文全集》已经出版（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收入了鲁迅的全部译作，为深入研究鲁迅的翻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鲁迅译作的单行本异常丰富多彩^②，同样具有重要的版本价值。

忽视鲁迅的这一半将无法真正理解鲁迅。日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丸山升说得好，“对于留下的翻译数量堪比包括小说、杂感在内的创作的鲁迅来说，翻译恐怕和创作一样，在他内面作用巨大。”^③

鲁迅的翻译作品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涉及15个国家、110多位作者，近300万字。从大的方面来分，可分为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剧本、散文、随笔、童话等多种体裁，以俄苏和东欧的作品为主，日本以及法国、荷兰、西班牙等国的作品也占一定的比例。就理论作品的翻译而言，20世纪20年代早期以一般的文学理论著作为主要对象，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则集中于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此外，鲁迅还翻译过一部《近代美术史潮论》和《药用植物》。

从时间上来看，鲁迅从事翻译活动要远远早于创作活动，鲁迅最早的小说《怀旧》创作于1911年（发表于1913年《小说月报》4卷1号），而他最

①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67、169页。

② 198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时举办过“鲁迅著作版本展览”，以鲁迅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藏本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他翻译的书，按出版年代分为1936年以前、1937~1949年、1949年以来等部分，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详见《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一书（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之附录《鲁迅著作版本展览书目》。

③ 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早的译文《哀尘》完成于1903年。这里有近十年的时间差。中国近代的外国文学翻译虽然可以上溯到19世纪70年代，但直到1899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的问世才真正揭开了翻译文学的序幕。鲁迅从1903年开始直到1936年去世，始终是这一事业的参与者，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别求新声于异邦”^①的理想。

鲁迅早期的译作《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基本没有摆脱当时潮流的影响，近于编译；标志鲁迅在翻译上自成一家的是他与周作人共同操作而于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两册。“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②《域外小说集》按照鲁迅当初的计划是准备不断出下去的，可惜这一计划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很快鲁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也结束了他早期的翻译活动。回国后鲁迅先后在杭州、绍兴的几所中等学校任教，课务甚重，业余时间以采集标本、辑校古籍为主，翻译工作虽然也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之中，但大抵是受人之托，译些地质学、心理学方面的东西^③，同他本人的志趣并不一致。辛亥革命后鲁迅任职于民国政府教育部，由此到五四运动之前的七八年间，鲁迅的翻译作品很少，只有零散的几篇，如刊登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1913年8月、10月号上的《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等。这段时期鲁迅并非不想从事翻译，他后来回忆说：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④

这里当然有许多谦辞，但也有不少真实。确实，在北京不像在东京时那样能够方便地找到翻译的底本，再加上民国刚建立，教育部的工作颇为繁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

②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言》，《鲁迅全集》第10卷，第155页。

③ 详见鲁迅1911年4月12日、4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335～337页。

④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重，也不像在东京时那样有大段自由支配的时间。事实上鲁迅如果不进教育部，他很可能会去上海从事编译工作。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就在许寿裳代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向鲁迅发出就职邀请的前夕，鲁迅“想到上海去当编辑。他托了蔡谷卿介绍，向大书店去说，不久寄了一页德文来，叫翻译了拿来看”，鲁迅“决定应考……他抄好了译文，邮寄上海”，但很快他就有了去教育部工作的机会，此事便不了了之了。^①

鲁迅曾经希望借助教育部的行政力量来繁荣翻译事业。1913年他在一份建议书中提出建立文艺会，一方面鼓励创作，“择其优者加以奖励，并助之流布”；一方面“决定域外著名图籍若干，译为华文，布之国内”^②——但这在当时是根本无从实现的。

在五四运动之前的那几年中，由于条件的限制，鲁迅在公务之余的主要工作是辑校古籍、抄古碑、读佛经，但他对别人的翻译成果却非常关注。191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该书除介绍西欧北美名家短篇小说外，又翻译了若干北欧和东欧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域外小说集》的事业。鲁迅看到此书后十分高兴，曾在为教育部属下通俗教育研究会所拟的审查意见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随着五四运动的到来，鲁迅不仅迎来了创作的高峰期，也迎来了翻译的多产期。在1923年《呐喊》出版之前，《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等多部译著已经问世；而在1926年《彷徨》出版之前，《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等译本也早已与读者见面。在鲁迅翻译活动的第二个阶段，他与二弟周作人的合作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事项。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就与鲁迅有过非常好的合作，1917年4月他由鲁迅介绍到北京大学教书，两人在翻译上面的合作也形成了第二度的高潮，这时他们联手打造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部书中，这就是增订本《域外小说集》、《现代小说译丛》

^① 详见周作人：《园的内外·鲁迅与书店》，《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256页。按关于此事鲁迅本人的说法是当时拟离开绍兴，“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周作人的回忆似乎更为准确。

^② 鲁迅：《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鲁迅全集》第1卷，第48页。

和《现代日本小说集》。1923年7月鲁迅、周作人决裂，从翻译的角度来说，从此鲁迅失去了一位好的合作伙伴（对周作人来说尤其是如此），而从两人在翻译的某些分歧中我们也不难窥见他们之间决裂的某种微妙的征兆。

1926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离开北京南下的鲁迅开始大量译介无产阶级的文学理论著作，最初主要是日本人的文章，稍后结集为《壁下译丛》。1929~1930年鲁迅又集中翻译了四部苏联的文学理论著作——《艺术论》（卢那卡爾斯基，现通译卢纳察爾斯基）、《文艺与批评》、《文艺政策》、《艺术论》（蒲力汗诺夫，现通译普列汉诺夫）。面对纷纷扰扰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争论，翻译这些理论著作成为鲁迅廓清自己思想的重要手段。在翻译的过程中，鲁迅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左翼文学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30年代鲁迅还翻译出版了多种苏联的文学作品，既有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毁灭》，也有《十月》、《竖琴》等“同路人”的作品。

鲁迅去世前还在翻译的是《死魂灵》。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时期就非常喜欢果戈理，但一直没有翻译过他的作品，晚年动手翻译果戈理的短篇小说《鼻子》和代表作《死魂灵》，可能正是为了实现早年的愿望，带有“朝花夕拾”的意味。

鲁迅早就强调指出，应当多读外国书。1925年他回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问题时甚至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① 1929年他又重申此义，说过两段很值得深思的话：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

倘要比较的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

^① 鲁迅：《青年必读书》，《鲁迅全集》第3卷，第12页。



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介绍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①

翻译之重要，这里已经发挥得题无剩义了。

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要理解鲁迅，首先就得了解他的翻译。这是因为当鲁迅决心弃医从文之初，打算做的事情就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并利用这种力量来改造社会。鲁迅晚年回忆说：

当我留心文学的时候，情形和现在很不同；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介绍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介绍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经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家，是俄国的果戈理（N. 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 Sienkiewicz）。日本的，是夏

^① 鲁迅：《现今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33～134、137页。

目漱石和森鸥外。^①

这是鲁迅文学活动的起点，而这种精神和工作的路径可以说影响到鲁迅的方方面面，并且贯穿了他的一生。

鲁迅留学日本，日语当然是他了解世界、关注外国文学的主要工具，但是既然要看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作品，只懂日语就显得不够了，于是他开始学俄语。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坚持下去，他从来没有通过俄文从事过翻译^②。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和仙台医专学过德语，而当时德国非常注意翻译欧陆的文学作品，于是鲁迅继续学习德文，在离开仙台回到东京以后，进了德语学校。从此德文成了鲁迅翻译外国文学的主要工具之一。早年他翻译三篇俄国小说收入《域外小说集》者，都是通过德文转译的。到晚年，鲁迅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也是通过德文转译的，同时参考了日文的译本。当然，鲁迅还有更多的译文是以日文本为底本，其中有些是日本的作品和论文，另一些则是从日文转译其他国家的著作。

鲁迅始终没有下很大工夫学英语，其英语水平远不如日语和德语，这主要可以从他青年时代学习的经历得到解释，而从工作路径价值取向的角度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鲁迅留日多年，日语水平很高，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行所无事。鲁迅用日文写过文章，也曾将自己的作品译为日文，又多次担任口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从1927年12月起亲自教许广平学习日语，教学效果非常之好，结果学生很快就能从日文翻译文学作品——这就是稍后出版的《小彼得》（上

①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1页。

② 同鲁迅一起学俄语的周作人介绍说：“鲁迅学俄文是在一九〇七的秋天吧，那时住在中越馆，每晚徒步至神田，路不很远，次年春迁居西片町，已经散伙，实在路远也不能去了。这事大概由陶望潮发起，一共六个人……教师是马理亚孔特夫人，这姓是西欧系统，可能是犹太人，当时住在日本，年纪大约三十余岁，不会说日本话，只用俄语教授……大家自己用字典文法查看一下，再去听先生讲读，差不多只是听发音，照样的念而已。”中止学习的原因除路远不便之外，更重要的是学费太贵（每月五元），负担不起（详见《鲁迅的故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281页）。鲁迅到晚年仍然能准确地读出俄语的单词和句子，并且看苏联的《文学报》，他对曹靖华说：“读还可以读，有时字意不懂。”（详见曹靖华：《叹往昔，独木桥头徘徊无终期》，《飞花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175页。）鲁迅藏书中有俄语字典。



海春潮书局 1929 年 11 月版，署名“许遐”，后来联华书局 1939 年重印本署许广平，而书名页仍题“许遐译”。许广平回忆说：“……先是教单字，但并不是照日文教学所排列的字母教起，而是鲁迅自己编出讲义来教的。教书时逐步深入，而又灵活地每天按时地学习。一共自编自教了二十七课。大约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学了一个月，就换了课本……那时，鲁迅正在主编《奔流》，后来又编《语丝》，此外，又与朝花社中人商量出《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又为青年校订译稿，答复青年来信，再加上自己写稿，所以每天都很繁忙的，但只要对青年有利，对人民有利，他就不顾一切地埋首做去。时间不够，则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对个人与集体都本此精神。即如教我日文，亦何尝不是从这宏心出发，黽勉从事？后来教到《小彼得》，在批阅我试译的稿件之后，更示范地亲自译出一遍，这就是现在收入《鲁迅译文集》里的译本了。”^①教法别出心裁，效果又快又好，无不表明鲁迅对日文的掌握已臻化境。

鲁迅的德文水平则要比日文低若干档次。茅盾曾经在回忆录里说过，“鲁迅的德文程度只能阅读，不能讲话”^②；在另外一处又提到，鲁迅虽然不能讲德语，但是听得懂。^③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日本仙台医专都学过德文，后来又进了东京的德语学校，虽然不一定非常正规地每天去上课，但总是正式学过德文，可以用为翻译的工具。前文提到，辛亥革命后不久鲁迅打算离开绍兴到一家大的出版社去当编译，就曾经用德文应试，他的德语水平不难推见，用来看书翻译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鲁迅到上海定居后，一度有到德国去的打算，为强化自己的德文，又下过一番工夫。许广平在回忆录里提过此事，“在有一个时候，他很想到外国去，自己在预备，每天自修，读文法，读书。那时他已经五十岁了，还是孜

①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我又一次当学生》，《许广平文集》第 2 卷，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1~272 页。

② 茅盾：《一九三五年记事》，《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00 页。

③ 详见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26 页。

孜不倦像个小学生”^①。她后来又补充说：“在上海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时候，自己就每夜自修德文至少有一年，大买一通有关研究德文的字典、辞典和德文书籍，如是经常每夜定出一定时间学习。见史沫特莱女士时，有时亦能用德语对话，史氏还称许他发音正确呢。”^② 但因为忙于种种，后来儿子又出世了，未能继续坚持。鲁迅对于学习外文一向予以高度重视，不懂一两门外语，在他看来是很可惜的事情。

鲁迅的文学活动以翻译始，以翻译终——翻译是他一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走上创作道路带有某种偶然的因素，而翻译则是他始终不变的初衷，是实现“转移性情，改造社会”^③ 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是事情往往会变成这样：本人所注重的与他人和社会所看重的往往不一致。林纾所看重的是他的古文，而社会所看重的是他的翻译，便是一个著名的先例。长期以来，鲁迅的创作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而鲁迅的翻译却受到了很大的忽视，两者的比例严重失调。而实际上，不研究鲁迅的翻译就讲不清鲁迅创作中的很多问题，全面研究鲁迅更离不开对他一生翻译活动的研究。

三

对于鲁迅翻译的评述和研究在鲁迅生前就开始了，特别是鲁迅关于“硬译”的主张曾引起很大的争论，一直到今天，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本书第一章将对这一问题以及鲁迅如何选择翻译材料的问题作一全面的回顾与探讨。

就鲁迅的众多译作来说，长期以来国内外的研究一直非常零散，给人许多启发却缺乏系统性。早先李长之先生在写他那本著名的《鲁迅批判》时草拟过一份研究计划，在《鲁迅先生著译之总检讨》的大题目之下，列有七个

① 许广平：《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的学习精神》，《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

②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北京时期的读书生活》，《许广平文集》第2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243页。

③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1页。



小题目——

鲁迅翻译的文艺论

鲁迅翻译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艺术观

鲁迅翻译的剧本与小说

鲁迅翻译的散文随笔

鲁迅翻译的童话

鲁迅对旧籍之整理著作

鲁迅之杂著与杂译

除第六项外，皆与翻译研究有关，但这只是一种设想，未能完全落实。^①但不管如何，仍然可以说是系统地从事鲁迅翻译研究之先行者。

这一方面到目前为止只有两部专著：瑞典学者罗德堡博士的《作为翻译家的鲁迅：鲁迅对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译介，1903～1936》（斯德哥尔摩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②和国内学者王友贵教授的《翻译家鲁迅》（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两书全面地梳理和分析了鲁迅一生的翻译活动，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本书的重点在于讨论翻译活动与鲁迅思想（兼及创作）之间的关系。鲁迅曾经声明过，他所翻译的东西不一定是自己完全赞成的，而自己很以为然的东西却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略去不译；^③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研究鲁迅的翻译与其思想之间的关系，只是需要做更为细致的分析工作。鲁迅的译与不译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评论都折射、包含着鲁迅的某些思想，那么，通过译文及其相关材料来了解鲁迅的思想也就非常重要了。相关材料首先是鲁迅为每部译作所写的“附记”一类的文字，鲁迅在其中往往多发议论，正是就不可能同自己思想完全一致的所译之文发表感想和评论。将译文和附记联系起来

① 李长之：《鲁迅批判·后记》，《鲁迅批判》，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174页。

② Lennart Lundberg, *Lu Xun as a Translator: Lu Xun's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1903～1936*, Stockholm University, Orientaliska Studier, 1989.

③ 详见《〈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研读，最容易了解鲁迅的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幽微之处。此外，鲁迅在杂文、日记、书信中也间或涉及翻译，所有这些是本书力图尽量使用的材料。

本书将采取点面结合的方式，将鲁迅一生的翻译活动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选取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解读，兼及其他文本，突显各个时期的特色和鲁迅思想的变化。这是本书二、三、四章的主要内容，也是本书的重点。

罗著和王著基本没有对翻译的技术层面进行研究，而这是本书准备包括在内的：鲁迅的译作在翻译方法、遣词造句等方面并非一以贯之，而是随着时期的不同、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对此本书也将给出描述和解释。这其实是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但由于鲁迅的翻译涉及多种语言以及转译的问题，要想讲清楚语言层面的所有问题，具有非常大的难度。尽管本书的重点是“文化层面的翻译研究”，但对于这一传统领域也不因为困难而完全回避。

罗著所无，王著有所论及，而本书准备详加讨论的是鲁迅与翻译合作者的关系，具体说来，就是前期的周作人、齐寿山和后期的许广平、瞿秋白，重点是周作人，因为周氏兄弟不仅合作时间长，而且成果丰硕。周作人是“天生的回忆录作者”，他的回忆录中有许多关于鲁迅早期翻译活动的记录，这是本书将经常引用的。其他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士的回忆文章也将用来与鲁迅本人的论述互相参证。此外本书还将鲁迅参与和主持的几套翻译丛书与杂志包括在讨论范围之内，因为这些丛书与杂志中的许多译作都是鲁迅想翻译而没有翻译的作品，与鲁迅的思想、创作有着间接却密切的联系，包含这一部分将使鲁迅的翻译活动更加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部分同样是罗著和王著没有或较少论及的。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讨论鲁迅翻译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在第二、三、四章中已经有所讨论，这里主要从工作模式上考察鲁迅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动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彰显翻译活动在鲁迅一生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与价值。

总之，本书力图通过对鲁迅翻译的研究，更为全面和深入地阐述他的思想、创作和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

第一章 鲁迅的翻译思想

第一节 关于“硬译”

通读鲁迅的全部译著，很容易形成这样鲜明的印象：创作部分文字十分流畅，而翻译部分文字则多半比较艰涩，仿佛出自两个人的手笔。以鲁迅的语言能力和文字功力来说，使译文做到流畅自然是不难的，他翻译的童话就相当流畅易读，所译的日本小说可读性也比较好，而另外许多译文却相对艰涩。

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从《域外小说集》开始，鲁迅始终坚持严格直译的方法，或者用他本人后来的说法就是“硬译”。关于“硬译”，他是这么定义的：“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①也就是尽可能接近原文的、尽可能等值的直译。一般地来说，鲁迅不提倡意译，他认为如果看重意译，输入的内容可能会走样，也无助于进一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

鲁迅的这一主张曾遭到许多批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批评人士的意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论敌的恶意攻击和朋友的善意劝告。我们不妨以梁实秋和瞿秋白作为这两类人士的代表，来回顾一下当日文

^①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00页。